

戴高樂與法國共產黨

吳圳義

(作者為本校歷史系專任教授)

摘要

戴高樂是一位國家主義者，一心一意只為維護法國國家利益和提高法國國際地位；法國共產黨則為一國際主義者，完全以蘇聯馬首是瞻。二者理應水火不容。

然而，自一九四〇年戴高樂成為法國抗敵運動的領袖，至一九六九年辭去總統職位為止，他與法國共產黨的關係，堪稱時敵時友。我們試圖透過法國共產黨的本質與發展、戴高樂的防共與反共，以及戴高樂與法共之合作等三方面之探討，來瞭解戴高樂與法共之間，時敵時友的情形，並分析其原因。

由本文研究的結果，我們發現戴高樂會與法共時敵時友，完全基於維護其本人，尤其是法國的國家利益之考慮。這是「政治是講求現實」的另一明證。

政治是現實的，政治家更要講求現實。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 自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流亡倫敦，透過「英國廣播公司」(BBC) 之廣播，號召法國人民繼續抗敵，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因區域化和參議院的改革計劃，在全民複決時有百分之五十二的法國人不表贊同而辭去總統職位。在這將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論在朝或在野，他與法國共產黨之關係，時敵時友。我們將透過二者或敵或友之關係，試圖證明戴高樂不但將「現實主義」表現在其外交政策，(註一) 同時也表現在其內政。

壹、法國共產黨之成立與發展

要瞭解戴高樂與法國共產黨之關係，首先要瞭解法共的特質及其發展。

對於大多數的觀察家來說，在西歐兩個最大的共產黨之中，法國共產黨似乎永遠較教條式，派系意識較濃厚，與工業工人階級關係較密切，較依賴蘇聯。它比意大利共產黨較少受其周圍資產階級社會的壓力和影響。(註二)

依照「第三國際」(Komintern)的規章，「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首次在蘇聯找到一個真正的祖國」，「國際無產階級有義務促成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以及盡力保衛她，以對抗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因此，法國共產黨忠誠地追隨蘇聯政治的變動，唯其馬首是瞻，不顧自己所將遭遇的後果。(註三)

「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成立於一九〇二年。在初期，它尚能維持其獨立於政黨之外的傳統。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卻逐漸受共產黨之控制。法共與總工會的關係密切，謝基(Georges Séguy)在兩個機構皆擔任指導職位，即為一項明證。

有些學者認為法共基本上似乎仇視革命行動，較致力於征服新的選民。在自認為是共產黨的大部份法國勞工，並未使之成為一支革命的力量，其目的只是成為一股強大的投票聲浪，以提高其在既存體制中自身的物質利益。(註四)

然而，法共並非「社會民主化」，它不僅保有其特殊意識形態，而且也保有行動的方式，政治鬥爭的觀念和方法。(註五)

法國共產黨的誕生，顯得與眾不同。在德國和義大利，共產黨皆出身於社會黨的少數，但在法國卻不如此。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杜爾(Tours)舉行的代表大會，社會黨(SFIO)的多數派決定加入第三國際，且接受其在第二屆年會的「二十一個條件」(21 Conditions)。最後的表決是三千零二十八票對一千零二十二票。在這些條件中，有嚴格遵守第三國際的決定，以及改變名稱。

久雷(Jean Jaurès)所創的「人道報」(*L'Humanité*)仍為共產黨的機關報。布魯姆(Léon Blum)及其追隨者另成立一個社會黨，另創立「人民報」(*Le Populaire*)為其黨的機關報。因此法國共產黨可謂戰前社會主義的直接繼承人，將擁有

比如須重起爐灶時更穩定和更廣泛的基礎。(註六)

在一九二一年，法國共產黨有黨員十三萬人，但經過排除無政府主義、機會主義等異已後，在一九二五年，只剩四萬人。此時，它在新的基礎上重新改組，使之非僅適用於選舉的活動，又能利用企業小組為基礎，集合所有黨員，進行宣傳和行動。

法共的最基層組織為小組 (cellules)，集合一些小組變成分區 (sous-rayons) 和區 (rayons)，然後再變成省級的聯盟 (fédérations)。這是結合在當地有共同物質利益人們的彈性組織。由於利害與共，彼此的結合就非常牢固。法共在組織方面縱的聯繫，使之能減少警察的監督和迫害的影響，也能很容易轉入地下活動。(註七)

然而，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八年間，法國共產黨所獲得的選票漸增，其選舉方面得到的支持，大部份來自左派傳統的選舉人。一九二八年，法共決定以社會黨為必須加以摧毀的主要敵人，而且要在第二回合投票時維持其候選人，來對抗社會黨的候選人。為此，在兩個回合的選舉中，法共損失百分之四十的選票，其在下議院的席次只剩一打。

以後幾年，情況未能改善。法共因個人和政治的尖銳敵對而產生內部分裂。多萊 (Maurice Thorez) 在一九二九年被法國政府逮捕。他認為他被中央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出賣，他的同僚抓住此一機會，以拒絕為他付罰款來擺脫他。多萊一年後出獄，他描述法國共產黨為衰弱、黨員漸少、充滿相互猜疑、缺乏任何現實感、領導階層獨裁專斷。(註八) 在一九三二年的選舉，法共損失三十萬選票，約為四分之一。在第二回合的投票中，它仍有半數以上的支持者繼續投給它，對抗情況較好的其他左派候選人。如果社會黨也如法泡製，在那些共產黨候選人領先的選區，維持其候選人，共產黨必將失去它所保持的十個席次中的八席。

在下議院和各省區 (巴黎除外)，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力幾乎微不足道。但是共產黨本身並非以近程的選舉成功為首要之務。整肅、改組和路線的改變，使之逐漸成爲一個內部團結紀律嚴整的政黨。

希特勒 (Adolf Hitler) 上臺後，法國共產黨的戰術逐漸轉變。一九三四年七月，共產黨與社會黨簽訂一項聯合協定，創第三國際其他會員之先例。一九三五年，法蘇條約簽訂後，共產黨與社會黨和激進黨逐漸發展成「人民陣線」(Le Front Populaire)。一九三六年四—五月的選舉，共產黨獲得一百四十七萬票，國會席次由十個增至七十二個。共產黨支持社會黨

的布魯姆政府，但未參與。(註九) 此次選舉，共產黨員最大的收獲是在農村地區。它的得票總數比前次增加一倍，在某些以農為主的省份，其得票數為以前的三倍或四倍。(註一〇)

自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條約簽訂後，「人民陣線」已告解體，共產黨被禁，由孤立而轉入地下。此時，共產黨譴責「資本主義的戰爭」，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軍進入俄境，方才改變態度。共產黨此後加入抗敵運動 (Résistance)，並發揮極高的效率，因為其黨員經常具有犧牲的精神，且其組織很適合地下活動。(註一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共產黨對德國態度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完全受到蘇聯的指示。在大戰正式爆發的前幾天，法共採取親波蘭的態度。九月二日，它贊成對希特勒的戰爭。在史達林 (Joseph V. Stalin, 1879-1953) 攻擊波蘭之後，(註一二) 吉尤 (Raymond Guyot) 從莫斯科帶來第三國際明確的指令，法共為其先前的愛國態度受到莫斯科嚴厲的責備，法共因而變成強烈的和平主義者。它譴責這次的戰爭為「資本主義的」戰爭，攻擊其政府，且發起一項要求立即和平的運動。法共的高階層人員開始逃避兵役，法共頭子多萊即為一例。(註一三) 他們成為最惡劣的叛國者。

法共某些最具煽動性的刊物在納粹德國境內印刷。法軍將領深信，這些鼓動逃兵、與敵人友愛、以及拋棄武器的共產黨宣傳，為法軍迅速崩潰的主因。(註一四) 然而，德軍的入侵俄境，卻又立即使法國共產黨反過來與德國納粹進行激烈的鬥爭，成為法國的「愛國者」。

法共借用「愛國者」的名義，利用與納粹鬥爭的機會，不斷發展其勢力。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法國共產黨控制「秘密軍隊」(The secret army) 的重要職位。「國家抗敵委員會」(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 (註一五) 的「軍事行動委員會」(Committee for Military Action 簡稱為 COMAC)，三位委員中的兩位為共產黨員，另一位則為共產黨的同路人。

「法國國內武裝部隊」(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 簡稱為 FFI) (註一六) 的總指揮官為遠在英國倫敦的克尼格將軍 (General Koenig)，但共產黨則提供當地突擊隊的大部份指揮官。在巴黎地區，法國國內武裝部隊由共產黨的羅爾·唐吉上校 (Colonel Rol-Tanguy) 指揮，而地方解放委員會的領袖則為另一共產黨員，托累 (Tollet)。地方委員會的成員至少有三分之一為共產黨員。(註一七)

儘管在戰時形成一股空前的大力量，有些學者認為法國共產黨並未認真考慮到要在戰爭結束時奪取權力。(註一八)法國光復後，法國共產黨在加辛 (Marcel Cachin) 的領導下，有一中央委員會。它在議會中有十一位議員，在內閣裏有兩位部長。

(註一九)法共的黨綱有下列四項(註二〇)：

1. 內政——黨對於合法生活的調適。
2. 選舉——與「國民陣線」(Le Front national) 配合。(註二一)
3. 外交——使法國遵循德黑蘭會議所做成摧毀希特勒政權的決定。
4. 社會——托拉斯之抑制，信仰、報業和結社的自由，工作和休閒權，國家提供給工人的社會安全，透過農會和合作社對農人的協助，農民財產的保護，阻止非農民購買土地。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因戰時逃兵被達拉弟政府 (The Daladier Government) 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判處六年有期徒刑的法國總書記多萊，經過五年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涯，重返法國，並獲特赦。(註二二)多萊和另一位法共領袖馬蒂 (André Marty)，也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的「政府公報」(Le Journal Officiel) 恢復他們的法國國籍。(註二三)

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進攻俄國之後，法國共產黨對德國納粹的鬥爭最為積極，犧牲也最為慘重。這種「愛國」的表現，贏得相當多法國人的支持。法共的勢力在戰時膨脹非常快速。

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法國舉行戰後第一次全國性選舉，要選出任期七個月的制憲議會。(註二四)在這次選舉，共產黨得五百萬票，佔總投票數的百分之二十五。(註二五)

戰後，共產黨黨員人數日漸減少。根據法國共產黨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在巴黎近郊召開的第十二屆黨代表大會的報告，共產黨黨員人數在一九四五年為一百萬左右，到了一九五〇年則減少至七十萬左右。(註二六)

在這次全國性的會議中，共產黨總書記多萊提到該黨的政綱：排斥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尊重聯合國憲章；加強法蘇同盟條約；廢除原子彈；法國、蘇聯、英國、美國和中國簽訂一項和平公約；波茨坦協議 (Potsdam Agreement) 有關德國非納粹化和非軍事化條款的付諸實施；東德政府的承認；中南半島戰爭立即停止；與東歐國家正常貿易關係的恢復；罷工權

、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等等。憲法規定的自由權之保護；軍費的大幅度刪減。(註二七)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法共領導人之一，國會議員法雍 (Erienne Fajon) 在該黨中央委員會，批評法共組織力量薄弱，如發動總罷工的失敗、共產黨籍國會議員杜克羅 (Jacques Duclos) 的被捕等等。法雍還提到，法共的選票漸失，黨員漸少，而且黨報銷售量也漸少。(註二八)

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巴黎召開的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中，法共書記謝爾溫 (Serin) 承認黨員人數從一九四七年的九十萬七千餘人降至一九五四年的五十萬六千餘人，其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為年在二十五歲以下。(註二九) 由此可見，共產黨未能吸引年輕人。

在一九五六年的選舉，共產黨大致維持其地位。它獲得百分之二十五點六的選票，一百五十個議會席次。(註三〇)

一九五八年的選舉，共產黨只得三百九十萬選票，(註三一) 十個議會席次。在法國第五共和的首次大選中，共產黨的得票數和議會席次會與第四共和的最後一次大選有如此大的懸殊，其原因有三：

1. 共產黨未能因都市化和大工業的成長而獲得一批新選民。這種現象可能導因於工人經濟情況的改善，或者是共產黨內部的腐化和停滯不進步。(註三二)
2. 戴高樂派以最有效的方式，充分利用人們對共產主義普遍的恐懼感。(註三三) 戴高樂的東山再起的確給共產黨一下雖非致命，但也是狠狠地打擊。(註三四)
3. 第五共和新實施的「兩次投票選舉制」(two-ballot electoral system)，幾乎所有政黨在第二回合的投票中聯合起來，以對抗共產黨的候選人。(註三五) 如果依照以前的比例代表制，這次選舉的第一回合投票結果，將使共產黨得到八十七個席次。(註三六) 然而，事實上共產黨所獲得的席次只有此一數目的九分之一。由此可知，新的選舉制度對於共產黨是相當不利的。

共產黨得到法國選民的支持漸少，在國會的席次又大不如前，難怪戴高樂在一九六〇年會說：

「我告訴諸位，本人不相信，目前在法國存在著共產黨的威脅，或者它可能影響法國的政治。有法國選民投票支持共

產黨，但情況已不如往昔，甚且每下愈況。我未見到任何理由，足以顯示共產黨會在法國政治的決策扮演任何角色。」
(註三八)

一九五八年大選的嚴重挫敗，導致共產黨的衰微。根據一篇美國政府官員給美國國會的報告，法國共產黨在一九六二年約有黨員二十五萬人。共產黨的衰微之勢，後因工人對經濟情況和右翼極端主義的影響覺得不滿，而告中止。(註三七)

在第四共和時期，共產黨經常獲得四分之一的選票；在第五共和時期，它只獲得五分之一。在一九六二年，共產黨不僅在國會改選時失去選票；在全民複決和總統選舉時，更是如此。

此一時期，共產黨仍顯得孤立，這並非它所願；共產黨經常準備伸出友誼之手，只是其他政黨不握住它。例如一九六二年，戴高樂為改變總統選舉為普選而舉行的全民複決時，共產黨就無法加入「反對聯盟」(Le Cartel de non)。在國會改選時，有戴高樂派候選人、「反對聯盟」的候選人，以及共產黨的候選人。(註三九)

一九六二年，多萊曾召集黨代表大會，討論黨的政綱、意識形態和組織的變革。一九六四年五月第十七屆代表大會，多萊被任命為榮譽主席，(註四〇)羅榭 (Waldeck Rochet) 繼任為總書記。這是一次被稱為黨章「年輕化」和「民主化」的大會。法國共產黨因而變成比意大利共產黨更有彈性。(註四一)

羅榭領導他的黨脫離史達林模式，逐步走向「異端邪說」(heterodoxy) 的最好證明，就是他支持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and) 在一九六五年競選總統。此一個人的決定，顯示其權威已達高峯，事實上也意味著法國共產黨有意在一個真正的反對陣營中，變成活躍而堅決的伙伴。他將法國左派 (The French Left) 之利益，置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之上。在這些方面，羅榭的領導類似赫魯雪夫 (Nikita S. Khrushchev, 1894-1971) 在俄國和杜貝克 (Alexander Dubcek) 在捷克的領導。(註四二)

到了一九六六年，左派，已括共產黨在內，還是沒有戴高樂派和中間派 (Centrists) 那麼對年青人具有吸引力。根據一項一九六六年的民意測驗，在二十一歲和三十九歲之間的回答者，百分之三十七傾向於左派政黨，而百分之四十五則稱將支持戴高樂派或中間政黨。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六五年間，共產黨在五十歲以下的選民，其百分比從七十七降至五十五。

法國左派未能吸引年輕選民的原因有三：

1. 年輕的激進份子不滿法國共產黨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早期所採取的不明確立場，以及後來在反對戰爭方面態度太溫和。

2. 共青團，尤其是學生組織，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分裂為三派：一派贊成忠於法國共產黨；另一派主張修正黨的教條，傾向於意大利共產黨所採取的路線；第三派則追隨中國共產黨。此一長期衝突，以及對分離份子用黨紀制裁，使黨員士氣和黨員人數雙雙受到打擊而趨於低落和萎縮。

3. 工商企業對年輕人逐漸重視，不但急於以他們為顧客，而且也招募他們於旗下。政府以其年輕的人口為傲，也設法延攬較年輕的公務員。戴高樂派延攬大批青年才俊從政，輔助他們贏得中央或地方公職人員的選舉。相對地，共產黨嚴格的階級制度，對於積極進取的年輕人似乎較缺吸引力，而且也顯得有些僵化。（註四三）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的選舉，共產黨的得票數再度超過五百萬大關，得票率也從百分之二十一點七增至百分之二十二點四。共產黨勢力的恢復可能有三個原因：政黨本身的演變；選民對其形象之改變（可能受戴高樂親蘇政策之影響）；共產黨對其左翼黨派態度之改變。（註四四）

自羅榭擔任法共總書記之後，他不但改變與法國其他左派政黨的關係，而且還調整對蘇聯的態度。一九六八年春天，捷克自由化運動在共黨總書記杜貝克的領導下，正如火如荼的展開，因而引起蘇聯和其他東歐共產國家的干涉。（註四五）四月二十二日，「人道報」刊登「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五個社會主義國家軍事干預捷克，法共頗表驚異和責難」。這是法共有史以來，首次與蘇聯產生分歧。這或許能成為法共擺脫一個可畏障礙之始，然而事實上，「人道報」很快就停止辯論。（註四六）

如同赫魯雪夫和杜貝克，羅榭也失敗了。他失敗的原因之一為「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危機」，（註四七）它破壞了羅榭和密特朗以和平方式推翻戴高樂多數地位的計劃。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起，發生在巴黎的學生騷動，迅速變成全國性的不安和暴動。緊接著學生的不安而來的是一連串的大罷工，在大部份的五月和一部份的六月，這些罷工、影響到交通、工業、公用事業和教育部門，癱瘓了法國的經濟，且一度使法國與外在的世界隔絕。

在危機發生期間，法國共產黨的處境很尷尬。它支持左翼極端份子但卻未得到好感。極左翼學生領袖柯恩·班迪 (Daniel Cohn-Bendit) 稱法共為「跳上行駛中火車的機會主義者」，(註四八)「史達林主義的浮渣」(stalinist scum) 和「叛徒」(traitors)。(註四九) 他和其黨徒批評共產主義只是「社會現存權力機構」的另一面。(註五〇)「法國學生全國協會」(Union Nationale des Etudiants Français) 的一位激烈的年輕領袖，魯傑 (Pierre Rouzé) 說：「(法國) 共產黨比我們更保守。我們不相信，以演進、以漸進的步驟，來產生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為可能。」(註五一)

左翼極端份子的態度和言論頗令共產黨不滿，且感覺到其威脅性。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工會——總工會 (CGT)，不斷對這批學生加以譴責，並設法加以壓抑。然而，法共總書記羅榭和法共機關報「人道報」，還是一再要求結束戴高樂政權。

一個多月的危機，帶給法國人日常生活許多困擾，也使他們對危機深懷恐懼，戴高樂派充分利用此一情勢，將所有的困擾和恐懼都算在共產黨頭上。戴高樂派發言人和謠言傳播者，製造和散佈共產黨正在計劃叛變的謠言。法共頭子羅榭警告個別的戴高樂份子，包括戴高樂的內兄萬特魯 (Jacques Vendroux)，(註五二)停止散佈此一虛構的事實。(註五三)

面對著戴高樂派猛烈的攻勢，法國共產黨似乎也盡其全力去說服法國人，相信其資產階級的本質。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下旬的國會議員選舉，許多共產黨候選人在散發的競選傳單上印著下列的標題：「反對無秩序和反對混亂——請投共產黨。」羅榭在從事競選活動時宣稱，其政黨為「法律和秩序的政黨」，一個曾在最近法國的暴動中表現一種「責任感」的政黨。(註五四)

在第一回合選舉結果揭曉後，「人道報」承認，法共試圖以一個尊重法律和秩序的文靜、民主，且幾乎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之姿態出現，以解除游離投票者之恐懼感的做法，並未成功。(註五五)

在這次選舉，戴高樂派在總數四百八十七個席次中，贏得三百五十一個席次，比前一年增加一百零八席；共產黨獲得二十四席，減少三十九席。(註五六) 難怪克里吉爾 (Annie Kriegel) 會認為，「很顯然地，羅榭為左翼份子短路 (the gauchiste short-circuit) 的最大犧牲者，而且比密特朗所遭受的損害更為久遠。」(註五七)

羅榭因長期臥病，他的總書記職位自一九七〇年起，由副總書記馬榭 (Georges Marchais) 所代理。(註五八)

貳、戴高樂的防共與反共

法國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而戴高樂為國家主義者。戴高樂的「戰時回憶錄」(*Mémoires de Guerre*)，字裏行間時時流露出他對法國的熱愛，這可說是其愛國主義的一座紀念碑。他的愛國心主要是受到家庭的薰陶。家庭的教養種下愛國的種子，作戰時的見聞使這個種子開始發芽成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期四年的海外奮鬥期間，戴高樂無時無刻不為法國的光榮、利益和主權設想。共產主義的本質顯然與他的國家主義不相符合。

然而，戴高樂之防共和反共，並非是純理論問題。他是個重視現實的人。他相信蘇聯與西方之間將有大戰發生，而那些對蘇聯的忠誠高於愛國主義的共產主義信徒就非得處處小心應付不可。(註五九)否則，法國的權益將受到危害，這是戴高樂最忌諱和痛恨的。

戴高樂在一九四七年相繼兩次在演說中譴責共產主義，以及蘇聯透過其同路人對其他國之滲透。

六月二十九日，他在家鄉里耳(Lille)的演說中提到，

「在自然資源、居民總數和人民之品質已經十分強大的俄國，儘管其本身為共同的大目標(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曾遭受損失，但由於其他國家的衰弱而變成相對地佔了上風。以勝利者的姿態佔領了半個德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一部份的奧地利。在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和大部份的波蘭、羅馬尼亞、芬蘭和普魯士之後，控制著華沙、貝爾格勒、蘇非亞(Sofia)和提拉那(Tirana)。這是藉用其外在的壓力，結合她在當地國國內所找到的同路人之力量的量所達成的。捷克也是在同樣的情況下落入俄國的掌中。在此時，俄國支配三分之二的歐洲大陸。除了壓垮個人的唯物論意識形態至今乃成爲俄國領導階級的精神原動力外，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我們法國，尚可發現具有此一意識形態的人們。這些人，以所有可用的方式，有意要建立其公衆獨裁，或者以其國家的軀殼和靈魂做爲掩護，以便使之附屬於引誘他們和指導他們的大事業。」(註六〇)

戴高樂的最後幾句話就是指法國共產黨。

一九四七年十月，法國舉行市議員選舉，戴高樂爲其「法國人民同盟」(*Rassemblement du Peuple Français*)於九月七

日在拜勇 (Bayonne) 所發表的競選演說中提到：

「在蘇維埃政權的鐵鞭 (les verges de fer) 下，我們見到三分之二的歐洲被孤立成一個龐大的人民和資源的集團，在這個集團裏人們的自由和國家的獨立逐漸被壓制。此一龐大集團領導者之野心，不論今日或明日，皆無法瞭解其極限。就是他們本身亦無法知道，因為獨裁通常成爲塑成它的力量之玩物！然而，我們瞭解十分清楚的，就是我們的國家面臨一項嚴重的威脅。在我們的人民之中，有一羣盲目忠於此一外國控制的分離份子 (separatistes)，他們的行動使威脅更爲嚴重。這些分離份子，以巧妙的戰略，利用我們的每一種困難，來助長混亂。他們認爲全國的騷動和失望最後將能達成他們染指共和國權力的目的，而法國將編入以他們爲前鋒的奴隸制度。」(註六一)

戴高樂稱共產黨爲分離份子，並一再譴責他們爲外國效勞。他在演講中，不厭其煩重述：法國正面臨來自一個外在敵人——俄國的威脅，而共產黨爲叛徒，只準備隨時背叛她。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共產黨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簡稱 Cominform) 的成立，曾經試圖以一個國家的政黨姿態出現的法國共產黨，仍然爲「共產國際的法國支部」(The French Sec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註六二)這足以證明戴高樂對共產黨認識之真確。

既然戴高樂認爲法國共產黨的「國際性」與法國的國家利益相違背，他當然要設法防範法國共產黨對法國國家利益可能造成損害。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戴高樂成爲法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在這段時間，開始了他與法國共產黨之接觸。當法國戰敗，戴高樂流亡倫敦之初，莫斯科的無線電臺都是不斷的指責「英國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戴高樂傭兵派」。但是等到德國的坦克越過了蘇聯的邊境，莫斯科電臺於一小時後，完全是讚頌邱吉爾和戴高樂的廣播。(註六三)

蘇聯態度的轉變當然也影響到法國共產黨。六月後法共所發行的第一份「備忘錄」(Cahiers) 卽表示，「所有法國人歡迎戴高樂的士兵，那些對抗希特勒的戰士。」(註六四)然而，法共奪權的野心並未因而收斂。它在法國大部份的活動，就是盡可能從其本國奪取權力。法共在此一任務成就非凡，法國幾乎面臨變成一個「人民民主國」(Popular Democracy) 的邊緣。(註六五)

戴高樂對此相當瞭解。在一九四二年初，他告訴英國，共產黨在法國正逐漸擴大其地盤，在勝利之後，有出現一個「俄國化」(Russianized)法國的危險。(註六六)

法國共產黨在德國佔領區內成立一個獨立於戴高樂派之外而屬於自己的抗敵組織——「國民陣線」(Le Front National)和其附庸組織——「突擊隊」(Franc-Tireurs et Partisans)。這些偽裝的組織，名義上完全具備非共的特性，而且很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色彩。它們所宣稱的目的，純粹是愛國的，甚至可以說是國家主義的，而且其領導份子也是一些不會引人懷疑的同路人。然而這些組織的控制權卻牢固地掌握在黨組織的鐵腕中，而全不接受在倫敦和後來在阿爾及爾的法國流亡政府之監督或視察。(註六七)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國共產黨同意將它在法國的秘密武装力量，併入戴高樂所領導的組織中。這完全是遵照莫斯科的旨意去做的。(註六八)表面上，共產黨表示願意幫助戴高樂。但是在背地裏，卻永遠不停地痛罵他為「荒誕的戴高樂」。(註六九)爲了團結全國的抗敵力量和爲了在盟國面前顯示他代表著整個法國，戴高樂願意跟共產黨合作，但卻對之深懷戒心。戴高樂瞭解，自從德軍侵入蘇聯後，共產黨即以戰爭英雄自居，加入抗敵行列且不惜犧牲。利用國家的災難和人民的痛苦，以造成全國性叛亂和社會革命。它妄想成爲公眾安全的主宰。共產黨的組織從未顧慮到良心的不安，從未受意見分歧的困擾，善於滲透和分化其他黨派，以及使用各種語言上的技巧。當全國變成無政府狀態與混亂不堪之際，共產黨極願意以能維持某種秩序的組織出現。何況歐洲的最大強國——蘇聯，對於不屑一顧的法國曾給予積極援助。因此，共產黨認爲維琪政權崩潰時，有機會在法國國內建立獨裁政權。(註七〇)由此可知戴高樂對於共產黨的伎倆和野心有相當深刻的瞭解。

一九四四年五月，國內抗敵運動成立軍事行動委員會，以統一對付德國佔領軍而採取的秘密軍事行動。在該委員會中，共產黨佔絕對優勢。透過這個委員會，法共領袖得以任命其黨員在抗敵運動中擔任區域性的參謀長。戴高樂爲抵制共產黨漸增的影響力，也設立自己的指揮系統。(註七一)

在法國國內武装部隊中，共產黨已能掌握佔游擊隊總人數三分之一的「突擊隊」。假如戴高樂不注意其指揮權的鞏固，則這一部份人將另外形成一股力量，企圖控制政府。加以其他單位，因不知應與何方取得聯繫，可能受共黨組織的欺騙誘惑而聽

從其指揮。在此一時期，共產黨正企圖壟斷國家抗敵委員會，使之與阿爾及爾方面分庭抗禮，成爲一個國內政府，將所有地下部隊置於軍事行動委員會之下，而由共產黨控制。(註七二)共產黨的伎倆雖巧，野心雖大，但由於戴高樂的洞燭機先，棋高一著，而終能維持抗敵運動的團結與統一。

在與納粹德國的鬥爭中，如以一個法國人來說，戴高樂或許會欽佩共產黨的地下鬥士之愛國表現；但是戴高樂，身爲法國的領袖，卻對國內抗敵組織及其領袖表疑懼。他知道，這些抗敵組織將試圖維持其軍事網，做爲和平時期政治目的之用，而且將要求在戰後的法國有主要發言權，以做爲他們對解放法國所付出的代價。戴高樂深深瞭解，在地下活動培養出來的團結精神和密切關係，將成爲他身爲國家領袖的運作自由之桎梏。他更擔心共產黨的力量和政治手腕。要想擊敗或控制他們，可能不似對季羅將軍 (General Giraud) (註七三)等政敵那麼容易。

針對共產黨在抗敵運動中的勢力所構成的嚴重威脅，戴高樂毫不遲疑地採取應付的措施。他必須利用其身爲解放者的充分權力和聲望。這就是爲何他要求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 安排讓他能隨第一批盟軍登陸法國，以及在解放後立刻著手進行控制國內抗敵運動。

戴高樂在其回憶錄中提到國內抗敵運動時稱：

「在緊要關頭，我發現它是與敵人鬥爭的一個有價值的工具；與盟國的外交，爲一項支持我的獨立和統一政策的基本支柱。」(註七四)

因此，對於戴高樂來說，「光榮的抗敵運動」基本上只是一個「工具」和一項「支柱」，當它不再適合他的目的，或他所認爲的法國的目的，就須解散。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晨，也就是戴高樂抵達巴黎的第四天，他在市政廳 (Hotel de Ville) 召集巴黎游擊隊組織的二十位重要領袖，其目的在於認識和讚揚他們，同時表示他準備將國內武裝部隊納入正規軍隊之決心。他接見國家抗敵委員會全體委員，向他們表示，巴黎一旦自敵人手中收復，國家抗敵委員會應成爲解放工作的光榮歷史。它再也不能成爲行動機構，因爲唯有政府才應負全部責任。有關公共秩序的維持，將由警察與憲兵負責，必要時由當地駐軍予以協助。民兵已不再有目標，

現存者必須解散。(註七五)

戴高樂下定決心要阻止共產黨顛覆法國。他知道共產黨滲透國內抗敵組織的嚴重情形，而且他還瞭解，甚至在非共抗敵份子中，有許多激進和革命的力量。這些都是他要打擊的目標。

在戴高樂所組成的臨時政府中，他也設法使共產黨的參與減少到最低程度，給他們像郵政部和空軍部等有名無實的職位。(註七六)此時，郵政部和空軍部事實上只是空殼子，因為空軍仍受盟軍最高統帥之指揮，而郵電業務除了軍事用途外可說不存在。在臨時政府總共二十二個閣員中，只有兩個是共產黨，此一百百分比與共產黨在法國的勢力和對戰爭的貢獻實在不成比例。

九月九日，亦即臨時政府改組的當日，共產黨在冬季自行車競賽場(Le Vélodrome d'Hiver)召開羣衆大會，以展示它在全國的實力，並藉此表示它對閣員分配不公的不滿。

戴高樂絲毫未爲此一示威所動。他深知，他的聲望不容挑戰，而且他有盟友，特別是對共產黨很敏感的美國人，爲其後盾，因此迅速採取行動，打擊共產黨的力量。十月二十八日，在美英兩國最後正式承認戴高樂的臨時政府之後，他立即獲得其內閣中大多數閣員的支持，發布一道命令，解散「愛國自衛隊」(the patriotic guards)和「民兵」(the national militia)，並解除其武裝。上述組織乃是武裝的平民，名義上接受「國家抗敵委員會」的「軍事行動委員會」之指揮。這是一股危險的和革命的力量之核心，因爲它的領導階層受到共產黨的控制。然而，它的基層人員大多數爲忠誠的法國人和抗敵英雄。他們不願意被解散，且以個人身份自動加入正規軍隊。他們要維持原來的單位，且以一種特殊的地位，帶著他們自己單位的旗誌和榮譽加入軍隊。

國內抗敵運動鬥士要求的特殊地位，戴高樂根本不會給與。他說，法蘭西共和國及其軍隊是一體的，不可分的。他決不屈服於此一問題，而且立即下令警察單位，解除所有未經授權的平民之武裝。抗敵運動領袖，尤其是共產黨，召開抗議性的會議。共產黨詩人亞拉岡(Louis Aragon)夫婦(註七七)和葉路亞(Paul Eluard)，聯合非共作家和藝術家、以及抗敵英雄魏古爾(Vercors)、塞拉克魯(Salacrou)和伊曼紐爾(Pierre Emmanuel)等人，參加抗議性會議，或者在共黨機關報——「人道報」發表文章。

十一月二日，法共政治局發表一份公報，首次公開譴責戴高樂：

「總理（指戴高樂）又再一次表示他對抗敵運動的鄙視，視之為全國努力中一項可以忽略之事。此一態度將使國家抗敵委員會，以及省和地方解放委員會極度的憤恨。」（註七八）

言及解放委員會的憤恨，可說是一種對戴高樂小小的警告，表示共產黨可能傳話給全國各地共產黨的當地領導者，製造困擾，甚至引起叛亂。此一威脅毫不空洞、荒唐，因為政府尚未能在受戰爭蹂躪的土地上建立可靠的聯絡系統或安全控制，而且在遠離盟國軍隊的法國南部和西南部的廣大地區，共產黨的勢力相當強大。

此時，共產黨不顧政府的指令，加強「愛國民兵」（the patriotic militias）的招募工作。這將成為革命的工具。或為未來政治權力鬥爭的有力籌碼。十月二十七日，狄克羅（Jacques Duclos）（註七九）親自公開宣布他自己贊成民兵。翌日，在來自抗敵運動的一片抗議聲和炸彈爆炸聲中，戴高樂正式加以排斥。

在光復初期，共產黨的革命未能成氣候，除了應歸功於戴高樂本人的威望和勇氣之外，俄共頭子史達林和法共頭子多萊的態度也有關係。

當俄軍向西推進之時，史達林的野心很大，但卻確定。他要擁有整個東歐，且非常自信，在與羅斯福總統達成協議，又得到邱吉爾心不甘情不願的同意之後，他的目的定能達到。然而他不希望以允許在法國發動一次沒有成功把握的革命，來破壞其偉大計劃。

戴高樂在十一月下旬也動身到莫斯科訪問，其動機之一，無疑地是為說服史達林放了法國一馬。他在離開法國到莫斯科的前夕，給予多萊特赦，讓多萊能回到法國。戴高樂這樣做的目的，在於獲得史達林的好感，同時也要軟化法國共產黨。

多萊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回到法國，三十日就在巴黎的冬季自行車競賽場向羣衆大會發表演說，喊出一些愛國的和顛覆性的口號，但意義都不明確。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亦即戴高樂從莫斯科返回巴黎後五週，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伊芙利（Ivry）集會。多萊宣稱他反對維持愛國民兵。他說，這些武裝集團在反抗希特勒佔領軍及其維琪同謀者時有存在的理由。然而，目前情況已不同。公共安全必須由正規的警察力量去負責。民兵，或其他非正規的武裝集團不須再維持下去。

多萊會制止共產黨的革命或許會得到來自莫斯科的指示，但其本身的心理因素也是重要關鍵。多萊未曾參加抗敵運動。在戰爭期間，當他遠在莫斯科過著流亡的生活之時，抗敵運動的共黨領導份子獲得很大的權力，這些是他極欲加以摧毀的。因此，史達林的政策剛好符合他本身的利益。法國共產黨革命的威脅也就很快地化為烏有；（註八〇）

然而，戴高樂還是時時刻刻都會注意到共產黨的威脅，而且也無意讓共產黨在法國政府中得到有真正權力的職位。他的此一決定，導致法國光復初期的最大危機，以及不久之後他的辭去總理職位。

共產黨和戴高樂派在戰爭最後數月間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雙方各自加強其地位。共產黨的據點為工人階級，以及知識份子的有力支持。戴高樂的力量幾乎遍及每一社會階層，層面很廣但很少像共產黨在煤礦、碼頭和巴黎近郊工業區等深深根植於某些主要部門。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之選舉，為光復後第一次全國性選舉，其目的在於選出一個任期七個月的制憲議會，以起草一部新的第四共和的憲法，這也是各方政治勢力的首次考驗。選舉的結果如左：（註八一）

共產黨	五、〇〇五、〇〇〇票
人民共和黨	四、七八〇、〇〇〇票
社會黨	四、五六一、〇〇〇票

上述結果證明共產黨為戰後法國最強大的政黨。在制憲議會五八六個席次中，共產黨佔一六〇席，社會黨一四二席、人民共和黨（天主教黨）一五二席，激進黨二十九席。這是法國政治史上，共產黨和社會黨以三〇二席之數，首次在議會中居絕對多數。（註八二）

三個大黨皆是在抗敵運動中最活躍的政黨，但兩個馬克斯斯政黨卻囊括了九百五十餘萬票。幸好，社會黨的資深領導者布魯姆和歐里歐（Vincent Auriol），為社會民主和反共人士。

戴高樂雖以全票被選為內閣總理，但他深深瞭解，對於這個共和國的控制將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因為他對於是否能強迫這個左派把持的議會來制訂一部憲法，將他們所認為行政機構必須擁有的權力賦予他一事，缺乏信心。

共產黨知道它在制憲議會的多數席次就是一張備而不用王牌，因此並不擔心暫時投票贊成戴高樂出任總理，避免太早彼此攤牌。

十一月十五日，當戴高樂邀請各政黨領袖商討組閣問題時，多萊認為法國第一大黨的共產黨，應該有權分配到國防、外交或內政等三大部門之一。戴高樂考慮到，做為外國勢力代理人的法國共產黨，如果掌握政府的主要指揮桿的話，一旦騷動發生，它就可以此來迫使政府就範。因此，他斷然拒絕多萊的要求。（註八三）

十一月十七日，他在向全國人民的廣播中，解釋此一決定，並無侮辱或歧視任何人的意思，而只是為了國家的最高利益。他說：

「……在部長的選擇方面，我無意去除任何民意的大趨勢，尤其是在選舉時獲得多數選票，且在議會中獲得較多席次的三個政黨中的任何一個。但是，很自然地，我期待一方面依照當事人的能力，另一方面依照其所屬政黨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來分配各閣員的職位。……

……我不相信能交給他們（指共產黨）三個指揮對外政策重要桿子的任何一個，亦即：表達它的外交，支持它的軍隊和掩護它的警察。」（註八四）

十一月十八日，法共政治局在多萊的主持下，召集會議，檢討「前政府首長蔑視民主傳統的廣播演說所造成的政治情勢」，宣稱這篇演說「重新並加重對法國共產黨的誹謗，使之被視為缺乏民族精神的次等公民。」法共政治局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戴高樂將軍已不再有資格組成一個聯合內閣，共產黨籍的議員將不再投他的票。共產黨表示它將支持古安（Félix Gouin）（註八五）為總理的候選人。

十一月十八日社會黨執行委員會在布魯姆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宣稱社會黨將反對任何只由兩黨組成的政府，假如人民共和黨和共產黨的領袖堅持各自的態度，社會黨籍的議員將無法參與新的內閣總理選舉的投票。

人民共和黨在十一月十七日集會，宣稱除了戴高樂將軍外將不接受任何人做為總理職位的候選人，而且仍然認為戴高樂和共產黨的衝突乃由於一場「誤會」所造成的。

經過幾次談判，最後找出一個妥協方案。國防部被分割為三軍部和軍備部。戴高樂以總理身份兼國防部長和三軍總司令，監督一切有關國防事宜。三軍部歸人民共和黨的米施累(Edouard Michelet)；軍備部則給予共產黨的狄翁(Charles Tillon)。(註八六)表面上，共產黨已得到原先要求的一部份，但實質上，戴高樂卻仍可以維持其原則，使軍隊不受共產黨的控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社會黨議員非力普(André Philip)，在共產黨的支持下，提出削減百分之二十國防預算的議案。戴高樂力阻未成，因而於翌年一月二十日自動退出政治舞臺。(註八七)

默默引退的戴高樂仍然以其潛在的影響力打擊共產黨。一九四六年，以共產黨和社會黨為主幹所草擬的第四共和憲法——一個一九七九三年憲法的翻版——於五月五日提付全國人民複決。複決結果，贊成票九、四五四、〇〇〇票，反對票一〇、五八五、〇〇〇票。戴高樂的影響力就這樣一聲不響地擊敗反對政黨，因為法國人民依然清晰的記得他對議會政治濫權的警告。憲法草案被否決後，六月二日舉行大選，以擁護戴高樂為競選口號(但未為他公開支持)的人民共和黨，以五百五十八萬九千票躍居第一大黨。(註八八)取代了原先共產黨的地位。

一九四七年初，第四共和政治體制開始運作。共產黨，以多萊為首，有五位黨員加入社會黨的聯合內閣。此時共產黨的態度：留在內閣，而且不因中南半島政策和社會政策兩個最敏感的問題而與社會黨決裂。(註八九)

然而，共產黨還是不斷為社會黨的政府製造困擾。政府似乎無法限制共產黨在議會的攻擊。共產黨集中全力企圖破壞政府的權威。三月二十二日在國會辯論中南半島問題時，共產黨籍議員缺席。共黨頭子狄克羅宣稱：

「當共產黨議員拒絕投票同意有關中南半島的軍事預算時，我們的黨已授權共產黨籍的內閣閣員在內閣的其他政策方面，不要破壞內閣的完整性。」(註九〇)

在國內政策方面，共產黨事實上也鼓勵人民拒絕付稅，他們製造暴動和社會不安使警察窮於應付。他們發動罷工和示威。(註九一)不實的謠言開始流傳，整個國家充滿激動和警示。利用盡可能削弱內閣權威的方式，共產黨希望轉移民衆對聯合政府的支持，並且使大眾在他們和戴高樂之間做一抉擇。

戴高樂本身充分利用共產黨的威脅：「在他們和我們之間，那是一個力量的問題。」許多種人，為許多不同的原因被吸引

到戴高樂陣營來。對於大部份以前不願意參加他的陣營的人，他似乎是重振國家權威和阻止共產獨裁的唯一足夠強大的力量。

(註九二)

「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大家很明顯的看出，儘管法國共產黨試圖以一個國家性的政黨出現，它事實上正是無法擺脫共產國際之陰影。該局成立之前，由蘇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波蘭、法國和意大利等九國共產黨的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波蘭的一個小的水上都市，召開秘密會議。在會議上，法共代表狄克羅得意揚揚地報告法國經濟復甦的情形，並以法共日愈以「秩序的政黨」姿態出現為榮。那知狄克羅的報告卻遭到蘇聯和南斯拉夫代表嚴厲的批判。南斯拉夫代表譴責法國共產黨，(註九三)經常願意保持合法性，不曾製造革命，且真正相信議會政治。(註九四)

「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後，法國共產黨忠誠地追隨蘇聯的政策。對許多法國人來說，共產黨似乎已經是一個相當具有危險性的政黨。

十月二十九日召開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造成與「國民陣線」(Le Front National)和「人民陣線」(Le Front Populaire)戰略的決裂。多萊強調，必須放棄參與政府，以及對在基本上彼此一致的社會黨和法國人民同盟進行戰鬥。現在不再是共和派團體對抗「極右派秘密團體」(Les cagoullards)的問題，而是要對包括社會黨和戴高樂派的「美國政黨」(Le parti américain)進行激烈的鬥爭。十一月的罷工浪潮與六月發生的罷工，在特性上迥然不同。前者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所有經濟和社會的事實，都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解釋。(註九五)

很顯然地，剛好在十月十三日和二十日舉行的法國地方性選舉，可視為一項對共產黨問題的全民複決。人民共和黨，在葉里歐(Edouard Herriot)等人的協助下，盡力想使此一選舉維持地方色彩，且以地方問題來進行競選活動。但是，很明顯地，選舉的結果勢必具有全國性的意義。

這次選舉，戴高樂贏得勝利。「法國人民同盟」在每一個大城市都很成功，在居民超過九千人的市區，該同盟的得票率為百分之四十。原來為右派傳統性地盤的大城市，如波爾多(Bordeaux)、雷內(Rennes)、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巴黎等，「法國人民同盟」獲得壓倒性多數。戴高樂將軍的小弟，彼耶爾(Pierre de Gaulle)當選為巴黎市長。該同盟還奪回傳統

上屬於社會黨的大城市，如里耳和馬賽。(註九六)戴高樂的勝利，造成社會黨和其他中間黨派的重大損失，但是共產黨卻尚能穩住其陣地。(註九七)它要到一九五一年的國會改選，才造成五十萬選票和七十四個席次的損失。(註九八)

一九五八年五月，戴高樂東山再起，他和共產黨的關係又進入一個新階段。在五月十五日，戴高樂宣佈準備「接管共和國權力」(to assume the powers of the Republic)，共產黨說他已「露出真面目」，攻擊他「要求個人權力，以建立軍事獨裁，不顧國會、憲法和國家元首。」在假定戴高樂將軍受到阿爾及利亞分離份子的支持，共產黨繼續譴責他有意將阿爾及利亞的政變擴展到法國本土，而且把法西斯主義移植到法國，增加工人的不幸，摧毀民主的自由，而且危害國家民族的獨立和統一。共產黨呼籲所有工人和民主人士團結起來，利用全國性的羣衆示威，增加向總統的抗議，採取行動防止任何改變的企圖，以阻擋戴高樂、法西斯主義和軍事獨裁之路。(註九九)

共產黨千方百計要阻止戴高樂的復出，而戴高樂的復出的確帶給共產黨不小的打擊。法國共產黨由於不斷的內部整肅，拒絕或無法像意大利共產黨那樣贊同一項知識生活，再加上教條的僵化，因此逐漸削弱其吸引力和動員能力。戴高樂的復出，使共產黨失去更多的選票。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六年，共產黨的得票數為五百一十萬和五百五十萬，到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則減至三百九十萬和四百萬。(註一〇〇)

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危機為戴高樂派用以打擊共產黨的大好機會。克羅齊葉(Brian Crozier)認為，這次危機的爆發，共產黨事實上並非在戴高樂的敵人之列。無論如何，事實很快就證明，法國共產黨已失去，他們以前或許可能有的，對暴力革命的嗜好。(註一〇一)

然而，戴高樂派還是盡量進行反共的宣傳，尤其是在隨著危機而來的國會改選競選活動中。戴高樂派在競選時採取一項簡單的戰略。他們邀請法國二千九百萬選民，在戴高樂所承諾的和平的社會和經濟改革，與共產黨的激進和革命性改革之間作一抉擇。此外，還將過去十年的和平與穩定，與革命份子十天的混亂作比較。

戴高樂派的競選口號為：投給戴高樂派候選人，即是投給法律、秩序和穩定；投給反對黨，即是投給混亂和「共產極權」的最大災難。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 1911-1974)總理在一次電視上的競選演說，提到在法國的五月革命中，假如左派

勢力獲勝，所將可能產生的恐怖景象。毫無疑問的，共產黨將加入政府，且逐漸建立獨裁政權，就如同他們在其他各地所做的一般。取代戴高樂成爲國家元首的反對黨領袖——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and)，在有抗拒共產黨奪權的任何表示時，可能立刻被推翻。龐畢度最後還強調：「今天，紅色旗幟可能將正式飄揚在法國的總統府和所有的市政廳。」(註一〇二)

六月二十二日，龐畢度在卡歐 (Cahors) 從事競選活動時，再度譴責「共產黨及其盟友」在五月暴動期間，試圖以武力奪取政權。(註一〇三)

叁、戴高樂與法共合作

戴高樂爲了國家的利益，或者自己的政治利益，時時會有反共的言論、以及防共或反共的做法；然而，如果情況所需，他也會與共產黨合作。

一九四一年夏天，希特勒揮軍進入俄國，這是戴高樂與共產黨合作的起點。德軍攻俄的消息使戴高樂決定走向蘇聯伸出友誼之手。當時他人在中東，卻立即電告留在倫敦的「自由法國」(La France Libre)：

「現在不必計較蘇維埃政權的毛病，甚至什麼罪惡。我們應當像邱吉爾一樣，非常坦白地聲明與俄國人站在一起，因爲他們正與德國人戰鬥。他們所摧毀的德國飛機、戰車、士兵，將不再用來阻撓我們解放法國。我要求你們立刻在宣傳上使用此一語氣。」(註一〇四)

戴高樂還派遣駐倫敦的代表去見蘇聯駐英大使麥斯基 (Maisky)，向他表示戴高樂希望和莫斯科建立軍事聯繫之意。(註一〇五)戴高樂深深瞭解一次蘇聯佔著重大份量的勝利，將爲這個世界帶來另一危機。他自己所以要這樣做，一方面自由法國需要生存，換句話說，就是要勝利，而蘇聯貢獻了這種可能。另一方面，蘇聯之參加同盟陣營，使戰鬥法國形成一個和盎格魯撒克遜勢力均衡的力量。(註一〇六)

一九四二年五月，蘇聯外長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 Molotov) 訪問英國，戴高樂趁此機會與他達成一項協議。協議中有關法國國內抗敵運動，莫斯科承認任何外國都無權使之不聽命於戴高樂將軍。(註一〇七)這是戴高樂針對國內抗敵運動中，

法國共產黨的勢力而發的。

史達林樂意跟戴高樂合作，並且在一九四三年的國際事務方面常比邱吉爾和羅斯福更加親戴高樂，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希望戴高樂能被迫在法國境內與共產主義妥協。(註一〇八)

在德蘇戰爭爆發後，戴高樂是否認為法國共產黨將立即在法國國內抗敵運動中扮演一項重要角色？事實上，在倫敦，一般人無法瞭解共產黨在法國的地下組織之真實性和重要性。自由法國情報機構已建立的接觸，也有無法精確地向戴高樂報告，共產黨的重要性和活動。在資產階級中，一般人經常試圖相信，自德蘇條約簽訂後，共產黨已失去其羣衆的影響力。維琪的報紙，或者佔領區的報紙，皆不談共產黨在法國的活動。國內抗敵運動的報紙，其中有一部份流傳到倫敦，未曾談到地下工作共產黨員的情況。因此，戴高樂至多只能預測，工人階級的戰鬥性將加強共產黨極權份子的活力。(註一〇九)

然而，上述情況對於戴高樂來說，應僅是次要的考慮。他之所以願意跟共產黨合作，最主要的就是要擴大自由法國的對外關係，(註一一〇)以及爲了團結全國的抗敵力量和爲了在盟國面前顯示他代表著整個法國。

法國共產黨是俄共的忠誠追隨者，戴高樂的親蘇政策有助於改善他與法共的關係。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共同意將其在法國的地下軍事力量，併入戴高樂的組織中。莫斯科對此事明白表示，此一結果爲其所最希望者。(註一一一)

事實上，戴高樂所領導的自由法國與法國共產黨的接觸早在半年前就已發生。一九四二年三月，戴高樂已決定要求與法共聯繫。五月，雷米上校 (Colonel Rémy)，一位傑出的自由法國情報人員，與一位共產黨的代表聯繫過，並曾談及暗殺德國人之事。法共的這位代表，化名「約瑟夫」(Joseph)。雷米後來猜測他可能是法共頭子多萊。

另一位自由法國的情報人員佛爾 (François Faure，化名 Paco) 已在一個月前有過接觸，且深信共產黨願意與自由法國合作。然而，共產黨以無線電傳遞情報給倫敦的承諾，事後證明毫無價值。不久，約瑟夫又跟雷米聯絡，並要求金錢的援助。這時雷米堅持要共產黨派一位代表參加倫敦的自由法國委員會。

一九四三年初，共產黨派遣一位代表，格尼葉 (Fernand Grenier)，前往倫敦，與蘇斯德爾 (Jacqueline Soustelle) 共事。

(註一一二) 因此，在法國國內的共產黨抗敵份子採用「洛林十字架」(The Cross de Lorraine)，(註一一三) 以及「勝利的V形標

誌」(The V of Victory)，然而這兩個標誌卻擺在共產黨自己的「鐵鎚和鐮刀」(Hammer & Sickle)之後。(註一一四)

戴高樂與共產黨的合作，並未讓他放棄對共產主義的懷疑。此時，他可能無法立即瞭解，隱藏在共產黨「愛國主義」的面具之後的全盤詭計。因為他有意把流亡政府遷到阿爾及爾，所以要設法贏得共產黨的支持。

戴高樂的情報頭子，「中央情報行動局」(Bureau central de renseignement et d'action)局長德瓦夫蘭少校(Major Dewavrin, 化名Passy)向他報告，美軍在登陸法屬北非時，很詭異地發現，共產黨為戰術的理由，支持季羅對抗戴高樂。蘇斯德爾也從法國國內情況注意到，共產黨以全力配合國家的奮鬥為藉口，有計劃的支持季羅。共黨領袖視其為戴高樂的政敵和一位有潛力的對手。共產黨自始即認為戴高樂是其奪權陰謀的唯一的真正障礙。

如果說戴高樂要討好格尼葉，基本上也是為戰術的目的，因為得到共產黨的合作，才能使他穩定他在阿爾及爾的地位和權力。

五月十七日，戰鬥法國總部(註一一五)宣佈，已在法國被佔領區成立一個抗敵委員會，以便從政治和軍事方面協調整個解放運動。該委員會包括「北方解放軍」(Libération Nord)、「南方解放軍」(Libération Sud)、「戰鬥隊」(Combat)、「突擊隊」(Franc-tireur)、「解放軍」(Ceux de la Libération)、「抗敵軍」(Ceux de la Résistance)、「軍民組織」(Organisation Civile et Militaire)和「游擊隊總部」(H. Q. Guerrillas and Partisans)等八個主要地下組織的代表，以及來自社會黨、激進黨、人民民主黨和共產黨，總工會(The C. G. T.)和基督教工會(The Christian Trade Unions)等政黨和工會的代表。(註一一六)

在任何情況，戴高樂皆不能失去法國地下抗敵組織的一致的支持。然而在此一地下抗敵運動中，共產黨以其隱藏的方法，已為其本身獲得超越其他組織的優越地位，而且戴高樂還得為此特權地位加以容忍。(註一一七)

在「國家抗敵委員會」中，共產黨的代表為莫西葉(Mercier)，受共產黨控制的總工會，其代表為薩依安(Louis Salliant)。薩依安在當時或許尚未成為共產黨的秘密黨員，但是他在表決時卻經常與莫西葉站在同一邊。「國家抗敵委員會」一開始就被共產黨滲透，因此無法採取反共產黨的態度。(註一一八)

一九四四年十月，國家抗敵委員會共產黨籍的委員爲季優 (Auguste Gillot)。(註119)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法國國家解放委員會 (Comité Français de la Libération Nationale) 在阿爾及爾正式成立。該委員會乃法國之中央政府，指導全國各地在戰時所從事的各種方式之努力，對所有未屈服於敵人勢力的疆土行使法國的主權，負責管理和保衛全球各地的法國利益，保證指揮權能在全國各地行使，與統率迄目前爲止已編入法國國家委員會的部隊及歸民政和軍事總司令所管轄之部隊。(註120)

共產黨企圖在這個阿爾及爾的臨時政府，取得一個堅固的立足點。然而在阿爾及爾的一般情況對他們不利。當地的法國居民非常保守，共產黨現在又不能呼籲阿拉伯的民族革命而不破壞其爲一個「愛國的」政黨之聲譽。然而，它尚能利用戴高樂所面臨的各方面的困難。一九四三年九月，戴高樂在其改組的初期準備階段，曾詢及格尼葉，有關他參與臨時政府的可能性。格尼葉覆稱，他必須徵詢在國內的法共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的意見。答覆在十一月一日才抵達。共產黨的領導份子要控制這個臨時政府中包括新聞局在內的重要部門，並且要自己擁有任命權。答覆的拖延爲法共政治局的一大戰略錯誤。因爲在九月戴高樂向格尼葉有此表示時，他仍然非常依賴共產黨的支持，但是在十一月，季羅已近乎失權，共產黨不再能玩弄以一位將軍對抗另一位將軍的把戲。(註121)

戴高樂對於共產黨的要求之答覆，因而相當冷淡。他宣稱，自己無法接受來自政黨有關其閣員選擇的命令。共產黨在最後只好退而求其次，而於一九四四年四月接受戴高樂所給的兩個委員的職位。格尼葉負責空軍部，此時自由法國幾乎無空軍，比優 (François Billoux) 爲國務委員。(註122)

一九四四年八月底，首都巴黎重返法國手中。九月五日，戴高樂組成臨時政府首任內閣。國內抗敵份子的代表抗議此一內閣受到國外抗敵份子的控制，他們要求在內閣職位的分配方面，國內抗敵份子應受到較公平的待遇和擔任較重要的角色。因此在九月九日，戴高樂重新改組內閣。共產黨籍的狄翁 (Charles Tillon) 出任空軍部長，取代其共產黨的同僚；比優則改任公共衛生部長。狄翁爲一鋼鐵工人，在德國佔領時期擔任巴黎解放委員會主席，且負責佔領區內共產黨的「突擊隊」的組織工作。(註123)

戴高樂剛成立的「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其內政很顯然地必須偏左，這是他解釋法國當前政治情況的結果。如此做，才能符合大多數人的期望。(註二二四)

在內政方面，戴高樂盡可能滿足左派人士的需求，在外交方面也要盡可能與蘇聯建立良好關係。戴高樂已經得到共產黨的支持，但是如果他無法獲得史達林的好感，他或許也會因而失去此一支持。戴高樂讓共產黨加入其臨時政府的做法，正合史達林之意。(註二二五)

為拉攏與蘇聯之關係，戴高樂於一九四四年年底往訪蘇聯，且在翌年年初簽訂法、蘇互助同盟條約。動身到莫斯科之前，他還允許法共頭子多萊結束在蘇聯的流亡生涯，返回法國。戴高樂認為，多萊的返法，以及共產黨參加其政府，為獲得國內和平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寧願讓共產黨與他共事，而非反對他。(註二二六)

對於戴高樂的訪俄與締結法蘇條約，「第四共和及其外交政策」(*La IVe République et Sa Politique Extérieure*)一書的作者葛羅謝(A. Grosset)認為其主要的動機之一，應為國內政治的考慮。利用莫斯科條約做為一項確保重建時期法國統一的工具。與史達林達成協議，有利於促使法國共產黨參加國家的重建。(註二二七)

費斯(Herbert Feis)也認為，戴高樂勉強自己去與蘇聯政府建立穩定的關係，其目的之一，就是確保其政府的地位和安定法國國內的情況，因為法國共產黨為一人數眾多的政黨，而且他正盡力設法與他們合作共事。(註二二八)

法國光復後，一九四五年十月舉行大選，共產黨獲得五百萬選票，成為第一大政黨。在戴高樂政府中，共產黨控制後勤部、經濟部、工業生產部和勞工部，其黨魁多萊則出任國務部長。多萊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自蘇聯返回法國後，即下達指令：「戰鬥」、「成立一支強大的法軍」、「重建工業」、「團結」。

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崛起有下列四個原因：

1. 在抗敵運動和整肅中，培養勢力；
2. 以經濟和社會的進步與愛國主義結合為號召，頗具吸引力；
3. 法蘇在一九四五年簽訂同盟條約；

4. 俄軍終能在最後驅逐共同敵人。(註一二九)

由此可見，戴高樂的親蘇政策有利於法國共產黨勢力的擴展。

在第四共和時期，戴高樂經常抨擊共產黨，但有時他也會與共產黨採取同一的立場。

在一九五一年，共產黨和戴高樂派在國會中共擁有二百二十四個席位。在外交問題的表決方面，其中反對「歐洲煤鋼共同體」(The ECSC)的有一百十七票，反對「歐洲防衛共同體」(The EDC)的有一百八十一票。(註一三〇)

「歐洲煤鋼共同體」由法國、西德、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六國組成。上述六國於一九五一年四月簽訂條約，一九五二年七月開始生效。

「歐洲防衛共同體」由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六個會員國經過一番艱辛的討價還價，而於一九五二年五月簽約。該項條約獲得荷、比、盧和西德等四國國會的批准。意大利國會未曾投票。在法國，它則造成兩年的政治鬥爭。保守派，包括戴高樂派，認為該共同體將使法國國家軍隊解體；左翼政黨則不滿其反共的色彩。戴高樂派和共產黨，所持的理由不同，對它的激烈的攻擊卻是一致的。一九五八年戴高樂重掌政權後，共產黨一直成爲一股反對力量。(註一三一)然而他在外交方面的爲難美國的作法卻頗受共產黨的支持。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軍事組織，即爲一例。

一九四九年，北約組織成立之時，法國爲十二個原始會員國之一。但是爲了法國國防自主等因素，戴高樂自一九五九年起至一九六六年止，逐步將法國的陸、海、空三軍，撤出北約組織的指揮系統。(註一三二)

戴高樂的此一做法，共產黨認爲是合情合理，(註一三三)而且首次拒絕在反對黨所提對戴高樂政府(撤出北約組織)的不信任案投贊成票。(註一三四)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第二十三屆蘇維埃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法共頭子羅榭還公開讚揚戴高樂退出北約組織的決定。(註一三五)

肆、結 論

法國共產黨於一九二〇年誕生。在誕生之後，立即加入第三國際，成爲蘇聯的忠誠追隨者，對蘇聯依賴的程度相當深。兩

者關係的密切，影響著往後法國的內政，當然也左右戴高樂與法國共產黨之關係。

一九四〇年法國的戰敗，使戴高樂一夜之間成爲法國抗敵的領袖，開始了他與法共之間長達三十年的時敵時友的關係。法共在本質上爲一國際主義者，它認爲蘇聯的利益高於法國的利益，這是國家主義者的戴高樂所無法苟同，甚至無法忍受。

然而，戴高樂處理對法共的關係時，並非全然以政治意識形態爲主，他還是相當講究現實，亦即以維護法國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利益爲優先考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與法共的關係，最爲微妙，也最爲複雜。自德軍攻入俄境後，法共立即成爲法國國內抗敵運動中，表現最積極，勢力最強，同時野心也最大的一股力量。戴高樂爲了團結國內的抗敵武力，鞏固其領導地位，同時還要向美英等盟國表示他所領導的抗敵運動之整體性，他必須處處跟共產黨合作，把共產黨納入他的抗敵運動中。但是戴高樂對於共產黨的滲透和野心瞭如指掌，當然也要設法防範，以免損害國家，或者自己的利益。

在第四共和時期，在野的戴高樂對於共產黨的攻擊，最爲激烈。或許由於不在其位，政治的顧慮較少，故能隨心所欲，暢所欲言。在此一時期，戴高樂派在外交問題方面的立場，有時會與共產黨不謀而合，例如「歐洲防衛共同體」問題即是。

一九五八年戴高樂重掌政權，共產黨居於反對黨的地位，對於戴高樂政策的批評和攻擊，不遺餘力。在第五共和時期，戴高樂爲提高法國的國際地位，不斷地打擊和削弱美國在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的影響力。他的此一作法，正合共產黨的胃口，因此往往會受到共產黨的讚揚。

從戴高樂與法國共產黨將近三十年的敵友之關係來觀察，不管是敵或是友，其主要考慮的還是現實的利害問題。

附 註

註 一：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法國承認中共政權，亦爲戴高樂的「現實主義」在作祟。請參閱拙著，「法國承認中共政權之始末」，政大學報第四十一期。

註 二：Annie Kriegel,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 the Fifth Republic", in Donald L.M. Blackmer & Sidney Tarrow ed. *Communism in Italy and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75), p. 6.

註 三：F. Goguel & A. Grosser, *La Politique en France*, (Armand Colin, Paris, 1964), p. 128. 在全國則有黨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秘書處。

註 四：James D. Forman, *Communism, From Marx's Manifesto to 20th Century Reality*, (Franklin Watts, Inc., N.Y., 1972), p. 120.

- 註五：F. Goguel & A. Grosser, *op. cit.*, p. 132.
- 註六：See note 3.
- 註七：Maurice Crouzet, *L'époque contemporaine, A la recherche d'une civilisation nouvelle*, (PUF, Paris, 1969), p. 86.
- 註八：Maurice Thorez, *Fils du peuple*, pp. 69-71.
- 註九：F. Goguel & A. Grosser, *OP. cit.*, p. 128.
- 註一〇：Gordon Wright, "Communists and Peasantry in France", in Edward Mead Earle ed., *Modern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51), p. 224.
- 註一一：F. Goguel & A. Grosser, *op. cit.*, pp. 128-129.
- 註一二：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蘇聯自波蘭東邊攻入，兩日後在附近與德軍相遇。九月二十七日華沙陷落，波蘭為德、俄所瓜分。
- 註一三：多雷在十月四日成為法國軍隊的逃兵。
- 註一四：Franz Borkenau, *European Communism*,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N.Y., 1953), p. 304.
- 註一五：「國家抗敵委員會」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組織，並於五月二十七日在巴黎召開首次會議，由 Jean Moulin 擔任主席，出席的代表有十七人。這是一個設在法國本土的地下組織，負責協調各個遊擊隊、抗敵運動、地下報業、工會和政黨。該委員會成立的宗旨在於維護國家政治和經濟的獨立，恢復法國的勢力、偉大和全球性的使命。
- 註一六：「法國國內武裝部隊」為戴高樂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所成立。他將所有法國國內地下部隊納入此一組織，規定它們儘可能按照典範編組成軍隊的排、連、團，規定其指揮的人數配戴相當的臨時階級。
- 註一七：James F. McMillan, *Dreyfus to De Gaulle, Politics & Society in France 1898-1969* (Edward Arnold, London, 1985), p. 145.
- 註一八：Wilfrid Knapp, "The Partition of Europe" in Ewan Luard ed., *The Cold War, A Re-appraisal*, (Frederik A. Praeger, N.Y., 1964), p. 52.
- 註一九：F. Billoux 與公共衛生部部長 Tillon 共同編譯。
- 註二〇：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Jan. 20-27, 1945), p. 6956.
- 註二一：「國民陣線」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成立，其成員包括從右到左的所有政黨，其中有傑出的天主教和新教的人物，大學教授和工會官員。主席由共產黨籍的居里教授 (Prof. Frédéric Joliot-Curie) 擔任。它的主要政策路線為：法國全力參戰，一支強大的國家軍隊，更快速的整肅，叛國者財產的沒收，不利農民賦稅的修訂，較佳的城市食品供應。
- 註二二：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6956.
- 註二三：*Ibid.*, p. 7477. 他們分別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and 二月二十七日被註銷法國國籍。
- 註二四：Brian Crozier, *De Gaulle, the Warrior* (Eyre Methuen, London, 1973), p. 391.
- 註二五：David F. Schoenbrun, *The Three Lines of Charles de Gaulle*, (Hamish Hamilton, 1966), p. 174.
- 註二六：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10679.
- 註二七：*Ibid.*
- 註二八：*Ibid.*, p. 12270.
- 註二九：*Ibid.*, p. 13830.
- 註三〇：Jacques Chapsal,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puis 1940*, (PUF, Paris, 1972), p. 274.
- 註三一：在一九五六年，法共得到五百六十萬選票。
- 註三二：Frank L. Wilson, *The French Democratic Left 1963-1969, Toward a Modern Party Syste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71), p. 50.
- 註三三：*Ibid.*, p. 215.
- 註三四：Brian Crozier, *De Gaulle, The Statesman* (Eyre, Methuen, London, 1973), p. 612.
- 註三五：Frank L. Wilson, *op. cit.*, pp. 29-30. 第一回合投票結果如無人能獲得絕對多數時，則在間隔一星期後舉行第二回合投票。候選人得票率少於百分之十時，不得參與第二回合的選舉。
- 註三六：Jacques Chapsal, *op. cit.*, p. 363.
- 註三七：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58-1962* pp. 208-209.
- 註三八：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June 9-16, 1962),

- p. 18809.
- 註三九·Jacques Chapsal, *op. cit.*, pp. 520-521. 然而在第二回合投票時，社會黨領袖 Guy Mollet 卻同意與共產黨組成「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
- 註四〇·多萊在當年七月十一日去世。
- 註四一·Jacques Chapsal, *op. cit.*, p. 520.
- 註四二·D.L.M. Blackmer & S. Tarrow, *op. cit.*, pp. 76-77.
- 註四三·Frank L. Wilson, *op. cit.*, pp. 50-51.
- 註四四·F. Goguel & A. Grosser, *op. cit.*, p. 131.
- 註四五·J.-B. Duroselle,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919 à nos jours*, sixième édition (Dalloz, Paris, 1974), pp. 708-710.
- 註四六·F. Goguel & A. Grosser, *op. cit.*, p. 131.
- 註四七·請參閱吳圳義，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危機，(政大歷史學報二期，臺北，民國七十三年三月)；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危機之影響，(政大專報五十期，臺北，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
- 註四八·"French Government and Reds Try to Contain Student Revolt",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8-19, 1968).
- 註四九·Why the French Communists Support Established Order", *The Times*, (May 29, 1968).
- 註五〇·Unrest in France, The students saw seeds of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8-19, 1968).
- 註五一·*Time*, (July 5, 1968).
- 註五二·萬特魯時為法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 註五三·Brian Crozier, *De Gaulle, the Statesman*, p. 625.
- 註五四·A First Round for de Gaulle", *Newsweek*, (July 1, 1968).
- 註五五·Gaulist Gamble Pays Off, Communists Admit Setback", *The Times*, (June 25, 1968).
- 註五六·*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Sept. 7-14, 1968), p. 22901.
- 註五七·D.L.M. Blackmer & S. Tarrow, *op. cit.*, p. 77.
- 註五八·*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24052.
- 註五九·Herbert Luethy, "De Gaulle: Pose and Policy", *The Foreign Affairs*, July 1965. p. 565.
- 註六〇·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46-1958, (Plon, Paris, 1970), p. 91.
- 註六一·*Ibid.*, p. 119.
- 註六二·Richard Barron,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France*, p. 165.
- 註六三·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L'Appel*, (Le Livre de Poche, Paris, 1955), p. 242.
- 註六四·Franz Borkenau, *op. cit.*, p. 316.
- 註六五·*Ibid.*, p. 315.
- 註六六·*Ibid.*, p. 321.
- 註六七·Herbert Luethy, *France Against Herself, a perceptible study of France's past, her politics and her mending Crises* (Frederick A. Praeger, N.Y., 1955), p. 55.
- 註六八·John L. Snell, *Illusion and Necessity, The Diplomacy of Global War 1939-1945*.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63), p. 114.
- 註六九·Charles de Gaulle, *op. cit.*, *L'Appel*, p. 289.
- 註七〇·*Ibid.*, *L'Unité*, pp. 6-7.
- 註七一·John L. Snell, *op. cit.*, pp. 132-133.
- 註七十二·Charles de Gaulle, *op. cit.*, *L'Unité*, p. 310.
- 註七十三·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法國國家解放委員會在阿爾及爾成立時，戴高樂和李羅兩人同為主席。七月三十一日委員會改組，戴高樂掌握軍政大權，李羅只保有主席之虛名。十一月九日戴高樂又將委員會改組，此時李羅已離開委員會。一九四四年四月他再被戴高樂解除總司令一職。
- 註七十四·David F. Schoenbrun, *op. cit.*, p. 170.
- 註七十五·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L'Unité*, (Livre de poche), pp. 381-386.
- 註七十六·郵政部長為 Augustin Laurent, 空軍部長為 Charles Tillon.
- 註七十七·亞拉岡的太太為 Elsa Triolet.
- 註七十八·David F. Schoenbrun, *op. cit.*, p. 173.

- 註七九：狄克羅，出生於一八九六年，曾任眾議院議員，後來為參議院共產黨籍議員小組主席，一九六九年為總統大選共產黨的候選人。
- 註八〇：Brian Crozier, *op. cit.*, *The Warrior*, pp. 326-328.
- 註八一：David Schoenbrunn, *op. cit.*, p. 174.
- 註八二：Brian Crozier, *op. cit.*, p. 391.
- 註八三：Charles de Gaulle, *Memoires de Guerre, Le salut*, pp. 319-320.
- 註八四：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40-1946*, (Livre de poche, Plon, 1970), p. 691.
- 註八五：古安為社會黨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當選為阿爾及爾的諮詢議會主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在巴黎集會的新諮詢議會也選他為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制憲議會又一致推舉他擔任同樣的職位。
- 註八六：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Nov. 24-Dec. 1, 1945, p. 7569.
- 註八七：David Schoenbrunn, *op. cit.*, p. 1783 Georges Dupoux, *La France de 1945 à 1969*, (Colin, Paris, 1972), p. 63.
- 註八八：David Schoenbrunn, *op. cit.*, pp. 185-186.
- 註八九：Alfred Grosser, *La IVe République et sa politique extérieure*, (Colin, Paris, 1972), p. 105.
- 註九〇：Ibid.
- 註九一：一九四七年五月和六月，法國發生罷工。
- 註九二：Richard Barron,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France*, (Public Affairs Press, Washington D.C., 1959), p. 165.
- 註九三：意大利共產黨也遭受同樣的譴責。
- 註九四：Alfred Grosser, *op. cit.*, p. 107.
- 註九五：Ibid, pp. 108-109.
- 註九六：Jacques Chapsal, *op. cit.*, p. 168.
- 註九七：Ibid, p. 174.
- 註九八：Georges Duby, *Histoire de la France, les temps nouveaux, de 1852 à nos jours*, (Larousse, Paris, 1972), p. 374. 共產黨的席次由原來的一十七席，滑落剩僅剩一〇三席。
- 註九九：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June 28-July 5, 1958, p. 16258.
- 註一〇〇：F. Goguel & A. Grosser, *op. cit.*, p. 130.
- 註一〇一：Brian Crozier, *De Gaulle, the Statesman*, (Eyre Methuen, London, 1973), p. 614.
- 註一〇二：“A First Round for De Gaulle”, *Newsweek*, July 1, 1968.
- 註一〇三：Pompidou plays on middle-class fears”, *The Times*, June 24, 1968.
- 註一〇四：Paul-Marie de La Gorce, *De Gaulle Entre Deux Mondes, une vie et une époque*, (Fayard, Paris, 1964), p. 198.
- 註一〇五：Charles de Gaulle, *L'appel*, p. 243.
- 註一〇六：Ibid, pp. 242-243.
- 註一〇七：Ibid, p. 248.
- 註一〇八：John L. Snell, *Illusion and Necessity, The Diplomacy of Global War 1939-1945*,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63), p. 132.
- 註一〇九：Paul-Marie de La Gorce, *op. cit.*, p. 199.
- 註一一〇：Ibid.
- 註一一一：John L. Snell, *op. cit.*, p. 114.
- 註一一二：蘇斯德爾於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被戴高樂任命為「法國國家委員會」的新聞委員。格尼葉則為其助理。
- 註一一三：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三日，戴高樂向法國人民宣佈，他已成立一支戰鬥部隊。他並依據強留 (D'Argenlieu) 的建議，讓自由法國的所有部隊，一律採用「洛林十字架」做為標誌。
- 註一一四：Brian Crozier, *op. cit.*, *The Warrior*, p. 253.
- 註一一五：一九四二年春，戴高樂將「自由法國」(La France Libre) 改名為「戰鬥法國」(La France Combattante)。但一般人還是將這兩個名詞混為一談。
- 註一一六：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May 15-22, 1943, p. 5769.
- 註一一七：Franz Borkenau, *op. cit.*, p. 324.
- 註一一八：Ibid, pp. 326-327.
- 註一一九：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6739.
- 註一二〇：Charles de Gaulle, *op. cit.*, L'unité, pp. 131-132; Her-

bert 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67), p. 138.

註一二一〇…德國歷史學雜誌載德樂。Franz Borkenau, *op. cit.*, p. 330.

註一二一一…Snell, Charles de Gaulle, *op. cit.*, L'unité; John L. Snell, *op. cit.*, p. 133.

註一二一二…*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Oct. 7-14, 1944), p. 6739.

註一二一三…André Siegfried, "The Rebirth of the French Spirit", *The Foreign Affairs*, vol. 23, No. 4, July, 1945.

註一二一四…Brian Crozier, *op. cit.*, p. 342.

註一二一五…*Ibid.*, p. 681.

註一二一六…Alfred Grosser, *La IVe République et Sa Politique Extérieure*, (A. Colin, Paris, 1972), p. 19.

註一二一七…Herbert Feis, *op. cit.*, pp. 472-473.

註一二一八…F. Goguel & A. Grosser, *op. cit.*, p. 129.

註一二一九…Simon Serfaty, *France, De Gaulle and Europe, The Policy of the Fourth Fifth Republics Toward the Continent*. (The John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1968), p. 64.

註一二二〇…Donald Blackmer & S. Tarrow, *op. cit.*, p. 74.

註一二二一…請參閱吳則義，「戴高樂林葛北約組織主要原因之探討」，政大學報第三十九期，民國六十八年五月；「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的軍事組織之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十一期，民國六十八年五月。

註一二二二…W.W. Kulski,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Republic*,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N.Y., 1966), p. 62.

註一二二三…Philip M. Williams & Martin Harris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De Gaulle's Republic*, (Doubleday, N.Y., 1971), p. 163.

註一二二四…Brian Crozier, *op. cit.*, *The Statesman*, p. 576.